

科学传播获得新动力

——第七届世界科学记者大会侧记

贾鹤鹏

刚刚在多哈结束的第七届世界科学记者大会，如同前几届一样，再一次为全球科学传播与科学新闻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除了启动新的科学新闻能力建设项目，这次由全世界 600 多名记者、科学家与科学传播工作者参与的大会，最大的亮点就是各方达成了共识：科学新闻并非仅仅是政经新闻的补充，而是改变世界的主要力量之一。

“从刚刚过去的阿拉伯之春到非洲各国的进步，再到中东各国投入巨资发展创新能力，无一不看到科学新闻和科学记者活跃的力量。”在本次大会上卸任的世界科学记者联盟主席、埃及科学记者 Nadia El-Awady 博士如此表示。

El-Awady 认为，科学新闻向人们传播了理性的科学精神和基于证据的立场，这对于变迁中的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这种理性和实证精神正是在社会变迁和动荡中人们极为需求的。

促进透明化

新闻传媒的力量能更好地推动世界的变革，其重要的作用就是促进公开和透明化，从而让百姓能更好地了解、督促和监督政府。对于科学新闻而言，这就意味着科研机构要通过媒体及时与公众沟通，这既包括其科研成果和相关工作的及时发布，也包括应对公众及媒体

对与科学相关问题的质询。

“对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来说，透明化意味着一切，我们的科学家要准备着随时接受媒体的质询。” CERN 的新闻发言人 James Gillies 表示。

CERN 拥有世界上能量最高的粒子对撞机——大型强子对撞机。Gillies 介绍，每年以及启动每个重大项目前，CERN 的传播团队都会和各部门的科学家一起，制定传播策略，还要做出应急计划。

长期以来的传播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耗资数十亿欧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以及 CERN 的其他重要科研工作，都在公众中赢得了支持。2008 年 9 月 10 日，大型强子对撞机首次启动，9 天后出故障被迫关闭，在众目睽睽之下停机数月进行检修，但并未招致强大压力。

美国科学院副执行主任、媒体关系部门负责人 William Kearney 则用实际的案例阐释了对于科研机构而言，透明化及与媒体的沟通有多么重要。

2009 年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期间，爆出了参与 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工作的英国科学家涉嫌操作数据来得出气候变化很严重这一结论的气候门事件。随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委托国际科学院委员会（Inter Academy Council）对此进行独立调查，而 Kearney 则受美国科学院委托负责该项目的传播工作。

收稿日期：2011-07-10

作者简介：贾鹤鹏，科学媒介中心主任编辑，主要从事促进科学传播能力建设的公益组织工作和以新闻为核心的科学传播研究工作，目前正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担任访问学者，Email: jiahepeng@263.net。

由来自中国的著名科学家、北京大学的方精云院士牵头的调查组经过多个月的调查,表明 IPCC 的科学结论是在符合科学程序的基础上做出的,气候门事件没有影响到 IPCC 有关全球变暖的科学结论的正确性。

由于当时各国舆论都有不少声音在质疑 IPCC 的结论,所以传播工作开展起来极为艰难。但 Kearney 介绍,从一开始,该项目的传播工作小组就开始分析舆论报道的特点,并在人事上做出了安排,包括为媒体提供能直接联系的科学家、邀请平常一贯对 IPCC 结论持批评态度的科学家对调查小组的工作进行评价、阶段性公布调查委员会的工作进展等。

Kearney 表示,通过传播工作,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的科学性和迫切性重新取得了共识。

2010年12月在墨西哥坎昆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重申了对 IPCC 及其工作的支持,IPCC 的科学结论作为国际谈判的基础也未受到影响。

传播状况待改善

虽然 CERN 和国际科学院委员会的传播工作给其科研项目的推进带来了甜头,但并非所有科研机构都愿意如此。一些与会媒体在讨论时,认为 CERN 耗资巨大、得到了全欧洲民众的关注,其理所当然要重视传播工作,但一般的科研机构可能缺乏这种强大的沟通动力。在发展中国家情况就更是如此。

在本届世界科学记者大会的一个专场“亚洲科学新闻之声”中,来自《越南投资评论》的 Nguyen Dang Vu Long 介绍,在越南,科研机构还没有形成与媒体打交道的习惯。很多新的科学发现还被认为敏感信息而不被发布。

来自印度的科学与发展网络 (SciDev.Net) 南亚地区负责人 T.V.Padma 介绍,在南亚,从印度到巴基斯坦,科研机构普遍不愿意主动与媒体接触,媒体中了解科学的记者也不多。而且,作为南亚地区最大的国家,印度的科学报道呈现了非常不均匀的特点。部分国际化的科

学记者用英文为 *Science*、*Nature* 杂志和一些西方大报撰写报道,素质和水平都比较高,但同时,在广大偏远地区,用各种本土语言报道科学问题的媒体的科学素质则普遍不高,信息来源也不通畅。“这导致了我们的很多优秀的科研成果不能传播出来造福社会。” Padma 说。

实际上,科学界与媒体沟通不畅并非仅仅限于发展中国家。

日本《朝日新闻》的科学版编辑高桥真理子介绍,虽然日本的科学记者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网络、不断开展各种培训活动,但日本科研机构也缺乏像西方同行那样体制化的媒体交流活动。

美国康乃尔大学科学传播学教授 Bruce Lewenstine 认为,这与亚洲自上而下的文化特点有关系:“在亚洲,学生一般不愿意质疑老师,而很多科学家对于媒体就像老师面对学生一样。”

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也存在试图控制科学信息流的尝试,而科学记者们则在持续与之斗争。

来自加拿大通讯社 Postmedia News 的 Margaret Munro 介绍,最近可以持续感受到加拿大政府控制科学家与媒体进行直接交往的情况。例如,2011年初,一名加拿大政府科研机构的科学家在 *Science* 上发表论文,表明鲑鱼种群可能受到病毒感染的影响,但论文发表后,政府禁止该科学家与媒体直接交流,理由是她正在接受利益冲突的调查。在类似的几起情况发生后,代表科学记者的加拿大科学作家协会发表了声明,对政府的行为进行抗议,并强调,科学家们自己有能力判断他们是否应该接受媒体采访。

信任第一

在这种环境下,固然需要各界努力,来推动整个科学界的透明化,作为科学记者,也要通过不断提高自己的科学素养,从而与科学家建立更牢固的互信关系。

通过了解科学家实际的工作意义及其在该领域中的相对位置，可以让科学家们相信，记者不会夸大或曲解其科学工作的意义，从而减少科学家对记者的不信任，美国《科学》杂志驻北京的亚洲新闻编辑石磊（Richard Stone）表示。

石磊介绍，在亚洲许多国家，很多全国性机构的科学家与政府官员比较容易接受采访，但地方机构则不然。很多国家级机构的科学家梦想着能在 *Science* 上发表论文，因此对于来自 *Science* 的采访也比较开放，对此，石磊已多次解释，接受 *Science* 的采访与有资格在 *Science* 上发表论文没有任何关系。但在地方上则不一样，例如有一次，石磊在报道一篇有关某种新病原体的论文时，他得到了中国卫生部官员的支持，但在该病原体鉴别地的云南省，当地却一直拒绝采访，即使有卫生部的许可。

与会者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说到底仍然是信任感。全国性机构的专家有机会经常接触 *Science* 杂志发表的研究，因此对该期刊的记者更加信任。相比较而言，云南地方的官员和专家则缺乏这种机会，所以也不太信赖来自 *Science* 的记者。

参加世界科学记者大会的各路媒体代表就如何与科学家打交道提出了各种见解，就总体而言，西方科学记者在这方面要顺畅得多，除了体制原因外，也与其工作习惯有关。西方科学记者往往遵循着科学界的惯例，及时跟踪科学家的科研进展，并根据论文及其研究体现出来的科研进展、社会意义和不确定性进行提问，更加容易为科学界所认可。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许多科学记者并非专职，很难有机会追踪论文进展，也就难以与科学家取得共识。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发展中国家媒体倾向于选用国际科学新闻来进行编译，这样做不但成本低，而且准确性高，这就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媒体在报道日本福岛核电站泄露事故时的做法。

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编译科学的做法既让科学新闻缺乏当地相关性，又让科学记者

和当地科学家们失去了更多通过直接交流来提升社会理性的机会。

而 El-Awady 则在大会上呼吁，科学记者在报道科研进展和质询各种与科学相关的热点问题的过程中，应促进整个社会来形成一种基于证据、基于科学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

创新机构助力传播

在本届世界科学记者大会上，多个国家的科学媒体中心作为科学传播的重要力量，开始第一次以联合的形象登上了舞台。

英国的科学媒体中心作为最早诞生的科学与媒体之间的中介机构，帮助记者寻找就其问题最为恰当的科学家，也经常组织记者就热点问题对相关科学家进行专访，此外还会不定期地为科学家和科研院所传播人员举办提高传播能力方面的培训活动。自从该中心于 2002 年建立以来，它已经在开发药用转基因作物、胚胎干细胞研究的合法化、气候变化以及核电发展方面就社会热点问题组织了多次科学家与媒体的沟通活动，为上述科研项目在英国国会中获得支持贡献了重要力量。

作为西方历史上最为成功的科学传播机构，英国的科学媒体中心并不是单向传播科技界的进展，而是将热点科学问题的交流、推荐在热点问题上最为恰当的科学家、满足媒体报道需求、科学家的传播能力建设以及记者的科学思维和科学素质的培养结合在一起。

虽然科学媒体中心是一个民间非营利机构，但它得到英国大部分权威科研机构和一些大型企业的支持和赞助。目前，它已经建成了包括近 2 000 名公共信息官、上万名科学家以及数千名与科学相关的记者的数据库，出现热点问题时根据需要调用，当然，它也同时依赖科学机构和企业公共信息官的推荐来选择适当的科学家。

为了确保其独立性，科学媒体中心要求任何一个赞助商提供的经费不得超过其年度运

营经费的5%，目前科学媒体中心有大约70多家赞助机构，该机构不承担任何为赞助商进行宣传的任务。

由于科学媒体中心的成就，它的模式已经被多个国家学习，科学传播者相继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爱尔兰、日本等国建立了科学媒体中心，中国的一些科学传播界人士，也在酝酿成立一家中国的科学媒介中心。2011年6月26日，在世界科学记者大会上，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媒体中心成员汇聚一堂，举行了各国科学媒体中心的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各国科学媒体中心成员达成了合作意向，将联合开发如何帮助科学家及科研院所进行科学传播的世界性教程和应用型网站。

世界科学记者大会的主办方世界科学记者联盟(WFSJ)也好消息不断。在2009年于伦敦召开的第六届世界科学记者大会上，WFSJ宣布启动了得到欧美多国政府资助机构支持、资助金额达200多万美元的Sjcoop(科学记者同行相助项目)二期，主要覆盖非洲和阿拉伯地区。如今，除了第二期项目进展顺利，联盟已经得到了加拿大政府承诺的支持，将专门开发一个亚洲版本的Sjcoop项目，促进亚洲科学记者和媒体之间的交流和能力建设。预计该项目在正式启动前，还会得到荷兰政府和瑞典政府的支持。

卡塔尔的科学豪赌

本届世界科学记者大会得到了卡塔尔基金会的大力支持，而该基金会凭借其石油美元的强大财力，在该国努力从高碳经济转向

知识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卡塔尔计划到2015年，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8%用于科研，这一指标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而卡塔尔的科研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卡塔尔基金会来履行的。

重金资助之下，美国的康奈尔大学、Georgetown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等纷纷在由卡塔尔基金会投资兴建、在沙漠中矗立起来的教育城(Education City)开设分校。这些分校一律授予美国本土承认的学历，惹得中东各国学子蜂拥而至，让卡塔尔成为中东教育与科研的中心。

诺贝尔获奖者、来自埃及的 chemist Ahmed Zewail 鼓励媒体，更多地报道中东科学的积极之处，从而让这里的科研工作能顺利蓬勃发展。

据来自中国、在康奈尔大学多哈校区作博士后科研的单景宣(音译)介绍，这里的工作安排与美国本土一样，但得到的科研资助却更多。这里的科学家申请卡塔尔基金会科研基金的成功率是36%，而在美国本土，申请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的成功率只有3%。

“当然，在这里能申请到NSF的成功率还会更低一些，因为毕竟目前整体水平还比美国本土差一些。”单景宣对《科学新闻》的记者如是说。

但即便如此，卡塔尔基金会大力发展科学的雄心还是处处可见。而且，该基金会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科学传播工作，除了介绍其资助的各项研究外，卡塔尔基金会还在积极支持包括Sjcoop在内的阿拉伯世界科学记者的素质建设项目。